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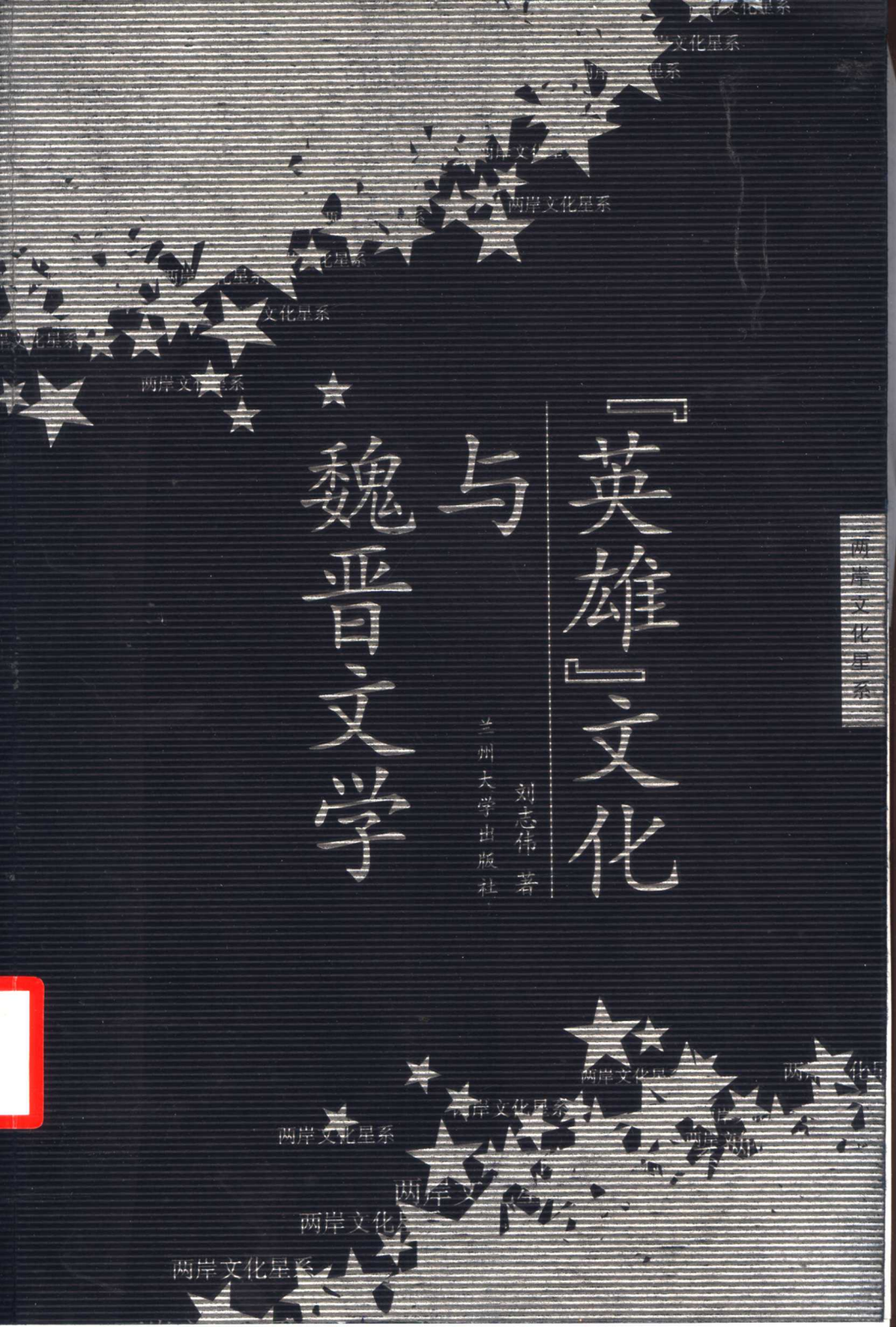
两岸文化星系

『英雄』文化

刘志伟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与 魏晋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 / 刘志伟著.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8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董乃斌, 龚鹏程主编)

ISBN 7-311-02223-1

I. 英...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9220 号

“英雄”文化与魏晋文学

刘志伟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 8617156 邮编: 730000

E-mail: 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甘肃地质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12.25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33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7-311-02223-1

定价: 25.50 元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董乃斌 龚鹏程

执行主编

李纪祥 刘志伟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小盾	王成勉	王兆鹏	刘志伟
刘跃进	陈 飞	尚永亮	李 浩
李纪祥	李朝东	张 兵	汪涌豪
张伯伟	张克非	张宏发	吴承学
陈晓龙	赵孝萱	高柏园	龚鹏程
董乃斌	傅 刚	蒋秋华	雷紫翰
翟本瑞	颜崑阳		

序

虽然因为政治的原因,海峡两岸的分隔睽离已逾半个世纪,但人民之间的往来和学术文化的交流,却因为中华文化的根系缠结、血脉相连而始终并未完全断绝。近年来,两岸的学术交往更是相当频繁。这里,既有学者间的互访切磋、合作研究和资料的共享,也有相互邀请客座讲学,或共同筹组举办学术会议等等;至于学者们各类著作在两地交互出版,或同时出版,也早已司空见惯。两岸学者的知识背景、学术趣尚乃至运作的路径、方法、习惯,都各有特色,如此交流,适足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些年来,两岸学术文化均颇有提升与进展,此种来往交流的推动促进作用不可低估。当然,目前还有种种的不方便不通畅不自由,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理想中的状态,所以,两岸有识之士都在做着进一步的努力——感人的愚公移山式的努力。

“两岸文化星系丛书”的编辑和出版,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丛书的研究对象是我们共有的中华文化,具体范围则是中国文学、史学、哲学与中国文化方方面面的关系,题目有大有小,可古可今,涉及面宽广,观念视角各异,方法手段不同,每本书都是一家之言,都力求有所创新,而归根到底则是从不同角度来审视、剖析、估量和论证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民族文化,既阐扬它的历史价值,也试图探寻它更新和发展的途径,而我们深心的抱负则是要使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汹涌波涛中稳立潮头,并且能够乘长风破万里浪。21世纪,中国

人、中华文化,理应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

丛书的计划则是从小做起,一辑一辑坚持不懈地做下去、出下去。我们的每一本每一辑或许只配算是一砖一石,但积累起来,却也能铺一段路。我们愿踏踏实实地为两岸文化和学术的交流,为中华文化的继承发扬,为中华民族乃至为世界的今天与未来,做一点事,愿以我们每一部呕心沥血的著述,充当前进之路的铺路石。“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先人的教诲永远策励着我们。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很具体地体现了祖国西部与台湾的合作。开发大西北,建设大西北,使之赶上东部沿海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步伐,是中国致富致强的战略关键,也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而目前,调动全中国全民族的力量投向大西北的态势已然形成,出现了几十年来最好的机遇。由台湾和大陆两地学人合作编辑这套丛书,并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我们在这个伟大事业所奉献的一点微力吧。

衷心祝愿“两岸文化星系丛书”顺利诞生,茁壮成长。
是为序。

董乃斌

2003年7月10日于沪上

序

中国历史上共有八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春秋战国、楚汉之争、三国、南北朝、隋唐之际、五代十国、宋金对峙，以及现在两岸分隔的局面。

每个分裂或分立的时代，都是历史论述的焦点，原因有三：

（一）政权由统一趋向分裂分立，再由分裂分立走向统一，其历程起伏动荡，最具有历史的动态发展意味，足以观古今之变，了解国家分合与兴衰之故。

（二）分立的时代，自然会形成政策、人才、资源、文化、社会、方略等各方面的对比性，形势既足资比较研究，自然吸引人关注。

（三）除了历程充满动态，内部又饱含对比之张力以外，分裂的时代亦必充满了各类冲突，包括军事与非军事之冲突，引生出许多故事，远非承平时期之平凡枯淡可比。我们看古代许多讲史小说都喜欢拿这些时代来评说渲染，就可以明白这一点了。

这么说，不免有些“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意味了。凡分裂分立之时代，其实都是不幸的。政权之争，往往形成军事与非军事的对抗、人民流离、骨肉失散，文化也常遭到撕扯。故其引人注目，令人为之讲说评议不断者，正因其易使人为之唏嘘浩叹也。

然唏嘘浩叹，愁苦之言易工，四海涂炭，也许反而成就了几卷好诗。而对峙与分立，事实上也让社会文化有了分别发展的机会，形成

不同的风景，足资观玩，此所以不幸之年代反而可能在文化上大放异彩，像春秋战国就是如此。

两岸自一九四九年以来，隔海分治已五十余年。岁月如流，人情未改，其间虽屡经波折，但终究断不了文化的根脉，两岸对中华文化的研究与发扬也各擅胜场，而且，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分隔反而形成了对比的张力，让文化的不同质素或面相，分别获得机缘，得以恣情展现。

但是，分隔的形势，毕竟又让这种不同难以交流，使得各自发展者无从因对照互补而交光互摄，创造一个更光辉灿烂的时代，这难道不遗憾吗？

我们策划编辑出版这套“两岸文化星系丛书”，就是希望能如精卫填海、愚公移山般，填鸿沟而移屏障，让两岸对文化的不同阐释得以交流对话，稍补历史造成的遗憾。

丛书取名“两岸文化星系”，一方面是拟喻星空中群星辉映、交光互影，共成一大星图之意；一方面也是因本丛书欲集结两岸文化研究具代表性、较有成就的作者与著作，共成一“群星会”，让如许熠熠星光，照映吾人心灵。

在这套丛书里，我们希望探讨：时间、历史意识与中国文化叙事方式；人文关怀理想与圣贤、英雄、游侠观念的联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与中华文化；爱情文化模式与中华文化；生命意识与中华文化等等。初辑五册，均由两岸中壮学者执笔，文采斐然，论析精警，无庸赘述。谨此敬识于台湾佛光大学云起楼。

龚鹏程
2003年7月

自序

说起来,著者近20年来致力于魏晋文化与文学,呕心沥血而结成一著作。耗费如此时间与心血,除了天份与学养之愧,尚有不得不如此的缘由。最主要的,是亟思以“英雄”文化研究来更新、拓展、深化魏晋文化与文学的研究。

如所周知,魏晋时代在中国思想和文化史上至为重要,也是20世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从魏晋学术研究的开山章炳麟迄今,可谓大师云集、名家辈出。仅就大陆而言,黄节、鲁迅、余嘉锡、刘师培、黄侃、陈寅恪、冯友兰、宗白华、朱光潜、容肇祖、贺昌群、吕思勉、侯外庐、唐长孺、周一良、王瑶、王明、戴明扬、陆侃如、王仲荦、何兹全、尚钺、王利器、杨明照、田余庆、王运熙、曹道衡、罗宗强、傅璇琮、周勋初、卞孝萱、袁行霈、汤一介、李泽厚、孔繁、许抗生、徐公持、葛兆光、王葆玟、王晓毅等,都享有盛名,汤用彤更被季羡林誉为难以超越。台湾与海外研究魏晋文化的方家巨擘,亦难尽数。经由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这一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学术积累相当深厚。以至有学者不胜惆怅:关于魏晋的研究似乎已达竭泽而渔的程度,不但重大课题大多被研究过,连细微的题目也见爬梳,重复研究现象尤其严重。

但是,繁花虽欲迷人眼,慷慨犹当披肝胆!难道成果累累就意味

着学术创新、拓展与深化研究的终结?深厚的学术积累不正呼唤全方位的整合研究?值得高度警惕的反而是:表面的极度繁荣往往造成普遍的视力盲点。它将泛化或真正掩盖对事物真相与本质的认识。魏晋文化创造的真正起点究竟是什么?魏晋文化的特质究竟是什么?魏晋文化创造不同于其它时代的原因究竟何在?显然,这些有关魏晋学术研究领域的关键问题,在20世纪,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21世纪,甚至还有被忽略、漠视、遗忘的危险。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也直接关系到21世纪的中国文化研究。对此,著者忧患意识殊深。故愿不避谫陋,在前线时修的研究基础上,尝试作出回答。

概括而言,著者对魏晋文化的基本认识,主要是这样一段话:由“英雄”崇拜到“文化英雄”(著者所用“文化英雄”与西方式概念有异)崇拜,由功业之思到追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与追求文化不朽,魏晋文化思潮有其合乎逻辑的必然发展。“英雄”崇拜与追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是魏晋文化创造时代的两大基本精神特征。曹操等汉末“英雄”群体的崛起,是名副其实的中国“英雄”时代的开始,汉末建安“英雄”时代也是光辉灿烂的魏晋文化创造时代的真正起点。汉末建安“英雄时代”的文化创造,其基点是“英雄”精神、“英雄”追求。正是“慷慨以使气,磊落以使才”的“英雄气”、“英雄才”与“英雄”追求,谱写出黄钟大吕般的“英雄”华章,造就了建安文化与文学的辉煌。魏、晋之际直到两晋,虽然“英雄”已渐远逝,政治环境也每多动荡、黑暗、腐败,但“英雄”精神仍被当时的“文化英雄”嵇、阮,潘、陆,左思直至刘琨、郭璞等所吸纳、接受与转化。故“英雄”精神是建安文化与文学的灵魂,是魏晋文化与文学鲜明特质的重要方面。同时,“英雄”文化又直接养育、深刻影响了魏晋文化与文学创造,是赋予魏晋文化与文学鲜明特质的重要因素。魏晋文化与文学具有高贵精神气质与崇高文化境界,多半由此。对于后世文化与文学创造来说,魏晋“英雄”文化深具“范式”意义,其“衣被后人”、“沾溉后世”者,多矣。

这些基本认识,著者在两部拙著《魏晋“英雄”文化研究》、《魏晋文化“英雄”时代》(即将另外出版)中,将有较系统探讨。作为前期成果,此一拙著也有较多讨论。

上编所收五篇文章,勾画魏晋文化创造时代的基本精神特征,讨论“英雄”概念、“英雄崇拜”、“英雄反思”与追寻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前三篇实为魏晋“英雄”论,后两篇可称为魏晋审美人生论。

前三篇中,首篇《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生成》,不止探讨魏晋“英雄”文化。著者认为,反思20世纪“英雄”文化研究,深究魏晋文化与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生成的关系,弄清中国古典“英雄”概念与西方式“英雄”概念的同异,对魏晋文化、文学研究与中国古代文化、文学研究,以及21世纪的文化、文学研究,均深具意义。故不憚辞费,以中、西文化比较为背景,花大气力考源辨异,以为中国“英雄”概念与西方式“英雄”概念实有质的不同。在西方文化中,“英雄”本指具有半神半人性质、主宰早期人类社会的杰出人物。中国古代“英雄”则特指不重天命的现实社会中杰出人物,只是依凭其个人的高度创造才能与后天奋斗精神,“英雄”才能够成为封建政治体制中杰出的文臣武将与创业帝王。中国古典“英雄”概念孕育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有着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其生成过程也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将“英”“雄”首次铸为新词究为何时,虽不能完全确定,但西汉末年班彪、方望等人,的确是较早使用“英雄”一词的。至于“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则在汉末三国时代。当“圣贤”所代表的天命、道德无以拨乱救世,强调个人才智至上的曹操等汉末“英雄”应运崛起,“英雄”崇拜遂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化思潮,“英雄”概念也就取代“圣贤”而成为时代的核心概念。故以曹操为典型的汉末“英雄”群体的崛起,不但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上“英雄”概念的真正生成,也标志着汉末三国“英雄”时代的开始。就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内涵来看,中华民族向有天人合一的特定文化心理,高度重视杰出人物与自然密切相关、相融相合的关系。对“英雄”概念的建构,既渗透着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特定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念,也与现实社会所谓“英雄”有所矛盾:由分别作为植物界和动物界精华“英”和“雄”作比,是高度肯定如同自然界的精华“英”与“雄”,“英雄”是中华民族人才最高层级的代表。同时,缺少了天命与道德的约束、制衡,“英雄”能否完美,端看“英雄”自我行事如何了。而就封建时代现实政治而言,一

方面,“英雄”每每挑战帝王之位,对以天命、道德为基的封建王朝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对“英雄”每多猜忌、迫害,“天下杀英雄”!故说到底,“英雄”概念的创造者是代表中华人文理想的封建知识分子,他们以理想眼光看待“英雄”,期望在“圣贤”概念已趋衰微、无能为力的时代,“英雄”能够真正安世济民,创造天人亲和、文明昌盛的太平盛世。今天来看,这样期待“英雄”与当时现实社会“英雄”自有反差,但“英雄”概念所蕴含的这种文化语义,的确是作为一种伟大气象、高贵气质和人文理想精神写照,是弥足珍贵的!著者由此想到,在20世纪,套用西方式“英雄”概念,把中国上古传说时代说成“英雄时代”几为定论,并对20世纪迄今的神话学、人类学研究产生深刻影响,也扩展、渗透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甚至还成为一些学者构建其中国文化研究体系的基石。但究其实际,显然是出于严重误解中、西文化的严重误判。就中国历史文化的演变而言,紧接上古神话传说时代之后的先秦两汉时期,正当我国“圣贤”概念生成和盛行时期,自为“圣贤”时代;至汉末三国时期,中国古典“英雄”概念方始真正生成,称其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英雄”时代,名副其实。中国“英雄”时代晚于“圣贤”时代,这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曹操是汉末三国“英雄”典型》,探讨汉末三国时代是“圣贤”淡出、“英雄”盛行的时代,崇拜“英雄”,呼唤“英雄”是汉末三国时代主潮,“英雄”崇拜体现了人们对才智超群、能够安世济民的政治人物的崇拜和渴盼,而曹操则是这一时代“英雄”的典型。他兼具“文”“武”两种才能,文能治国,武能安邦,追求建功立业,被视为拨乱反正的“英雄”典型。但同时,曹操也具有善、恶兼备的人格特点。他不仅成为创业帝王“英雄”典型,也被当时和后世视为阴谋篡权典型。此外,著者还探讨了刘备作为汉末三国“潜圣”人格形象典型的意义。

《“胡须”作为权力意志异化的象征符号》,则追求把握魏晋时代的文化思维模式,详辨魏晋时代与“胡须”相关的政治权势人物,如曹操、崔琰、孙权、司马懿、刘琨、王敦、桓温等,考辨《诗经》、《世说新语》、《晋纪》、《说文》、《玉篇》、《释名》、《晋书》、《风俗通义》等多种文献,由“胡须”作为“英雄”权力意志异化符号象征的事实,揭示出魏晋

有关“胡须”文化叙事中所深藏的重要政治文化信息。

后两篇,《“崇友”意识与魏晋家庭观念的演变》,由辨析“五伦”与“朋友”关系开篇,探讨“崇友”意识与魏晋风流人物追求审美化生活方式的关系。《“痴”与魏晋文化》则从文化语义学角度出发,探讨魏晋时代“痴”这一文化现象所蕴含的文化及审美价值。通过散见于史书说部的各种材料,详考“痴”这一文化现象大量存在于魏晋时代,是与当时门阀士族崇尚“早慧”相关联,并非后世所说的“痴呆”、“愚蠢”,而往往是被视作大器晚成的表现。认为“痴”气人生的本质是审美移情,是魏晋时代艺术化人生追求的高度象征。

中编十一篇文章,专门探讨著者所认为的魏晋文化与文学的八大家曹植、嵇康、阮籍、陆机,这是关于魏晋文化与文学代表人物的特定认识,与学界的习见认识不尽相同;下编之《音乐意象与魏晋诗歌》,探讨汉末建安之音“雅好慷慨”,并以美女与音乐同构象征审美理想,关注正始之音的沉思倾向。这些,也都体现了著者关注魏晋“文化英雄”怎样承接、吸纳、转化“英雄”气为巨大文化创造能量的思考。

二

新视角也与研究思路与方法上有所变革密切相关。

第一,追求使魏晋文化研究回归于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点。著者强调“英雄”时代为魏晋文化的真正起点,以曹操的个案研究作为研究魏晋“英雄”群体的典型,揭示以“胡须”与形貌象征权力意志变异的魏晋文化叙事模式,强调崇“友”意识与“痴”气人生对魏晋文化的深刻影响,注重曹植、嵇康、阮籍、陆机等个体创造对魏晋文化与文学创造的重要代表意义,都凸现了作为能动创造者的人的主体精神在追寻、建构美好世界与人生,张扬人的崇高性与独立价值方面,所具有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以及这种主体精神对形成文化与文学创造时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第二,与走特重归纳事实、现象的传统文化研究路径不尽相同,著者高度关注探讨中国文化语义学研究方法。概括来说,就是重视文

化时代的核心文化概念、重要文化概念、重要文化意象与时代文化事实、现象的互动影响关系,由文化概念、文化意象的生成演变来深入考察其对时代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关注由时代文化的发展变化所引起的意识观念的深刻变革。细心的读者当会发现,拙著诸标题中多有表示特指的引号。这是由于:拙著既考察由“英雄”与“圣贤”、“名士”、“游侠”、“痴”、“才气”等特定核心文化概念与重要文化概念关系所构成的魏晋文化概念框架系统,深入考察其消长变化的轨迹,以对文化概念框架系统的认知,来把握魏晋文化的深层结构;也以“崇友”、“胡须”、“人格”与音乐意象等,作为研究魏晋文化与文学的重要切入点。这种对文化语义的敏感与关注,自与借鉴20世纪西方文化语言学研究方法有关,但更多仍然是借重传统小学功夫。故著者对文化语义的阐释、发掘,渗透于严格的传统考释方法之中,也服务于魏晋文化与文学的理论探讨目的。

第三,关注探讨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思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利弊得失,呼吁向传统回归以拓展研究新路的呼声渐高:必须把中国古代文学放到其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化大背景下去考察、认识,根据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史、哲浑然一体的“大文学”、“泛文学”这种综合性、混合型特征去诠释、去评判,从中发掘出所蕴涵的传统文化精华和审美意义,揭示出对人类文明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推动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在新世纪向更高层次发展。这既是研究观念、认识的转变,也是具有高度紧迫性的学术实践课题。如何回归?回归何处?怎样拓展?拓展什么?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同仁以探索真理的高度勇气与责任去探索、解决。拙著尝试以魏晋“英雄”研究切入魏晋特定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也是期盼能够掌握进入和解读魏晋文学的钥匙,探寻这一时代文学研究真正的“阿基米德支点”,并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作出有益的思考。故拙著严忌空论、奇谈,以论为本、注重考信,追求义理考据辞章结合,期望打通文学、史学、哲学的学科壁垒,重视多学科的文化整合与客观实证的有机结合,重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特别是先秦典籍、现代中西学术背景与魏晋文化研究的关系,走以扎实考据功夫做严谨理论、思想

研究之路,力图从文化与文学的深层关系研究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

故拙著上编五篇,集中探讨对魏晋文学创作具有深刻影响的魏晋文化基本精神特征;中编九篇,集中探讨魏晋文学四大家及其创作与文化的关系;下编四篇,着重论述与魏晋文化有重要关联的文学创作现象。上编不再赘言。就中编说,如从“才气”探讨曹植的文学创作;从人格探讨嵇康与阮籍;从“崇友”探讨嵇康文学创作与文化的关系;从“长兄半父”考辨嵇康兄弟关系;从文化病理辨析阮籍人格现象;从审美意象探讨阮籍诗歌的审美系统、审美特征与阮诗“范式”;从音乐意象探讨阮籍的文学创作与音乐之间的关系,从创作作时探讨阮籍赋体理论思维的形成;从陆机诗、赋论探讨陆机的诗学、赋学思想价值等。就下编说,《音乐意象与魏晋诗歌》与《萧统与音乐赋》两文,给予学界所忽略的文学与音乐的关系以较多关注。前篇结合魏晋诗歌中大量出现的音乐意象和音乐语汇,探讨音乐意象与魏晋诗歌创作的关系;后篇则关注萧统《文选》中所收录的音乐赋,通过具体文本分析,探讨汉晋音乐赋业已形成的固定创作程序,音乐赋所表现的汉晋审美观念演进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句型文化与魏晋诗赋》以句型文化入手,检讨魏晋作家在增强诗赋的抒情功能时所采用的方式以及诗赋的骈偶化历程。《“文心”与“人心”正误》从文化创造与作家个人的关系等出发,纠正有关对颜延之、曹丕、陶潜等人的文化误读。

三

毫无疑问,学术研究必须严谨求“真”。但严谨求“真”并不意味着扼杀性灵与思想。想必每个学者都会有自己的学术梦想。著者以为,重性情、养气与养心,深恶平庸与人云亦云,贯注充沛的文化精气与原创精神,符合魏晋文化精神,甚至也为研究魏晋文化所必需。读者或当深谅拙著不可避免地带有著者趣味、性情与感悟的烙印。

首先,在中国历史上,魏晋文化创造时代最具艺术情调与浪漫气质,也是高度哲学化的,审美的灵光与理性的智慧达到空前的高度和谐统一。而此一时代的大部分时间,其黑暗程度,竟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这种情形,在人类文化史上大概也是罕见的。故魏晋文

化创造时代对著者具有永远的魅力，也引起著者无尽的感叹与沉思。选择魏晋文化研究，不能不说著者是服从于无限神往的强烈生命冲动。

其次，关注平凡出奇，发掘庸常、甚至不登大雅之堂的事物与魏晋文化创造时代的关系，以强调魏晋文化创造的难以企及。如从魏晋之“痴”发掘魏晋文化创造与审美特点；从“尘埃”来谈化腐朽为神奇是子建天才的重要标记。尤其由阐释“尘埃”的文化语义，来解释困扰古今学者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难题，认为与子建每每在建安“歌手”中“唱”得最好相比，“凌波微步，罗袜生尘”只有子建会“唱”，这是子建“八斗”天才的独占标记，窃以为有一得之见。

第三，拙著选题中的“英雄”、“痴”、“崇友”、“人格”、“才气”与“胡须”等，故出于著者对魏晋文化与文学现象的感悟、体认，也多与著者的人生以及对现实社会人生的观察、体认联系紧密。

著者喜欢沈潜式的涵蕴研究方式，不少选题的萌芽，也许可以追溯到十数年前，甚至源于著者的童年人生之梦。选题从提出到写作，也往往经历了较长或漫长的涵蕴过程。如“英雄”问题，是十数年来一直所关注、思考的，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恐怕还要继续下去。他如音乐意象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嵇康与阮籍的文化创造问题，亦复如此。而一些论据的关键点，则来自生命深处对一些微妙生命符号的接收。如发显“玄学”传统与王湛家族五代为“痴”的家风传承，认为在古今中外文化史上只此一家，决无分店；如论魏晋之“痴”被用来形容大器晚成时，还存在着公认的人物原型参照系统，是抓住王济评价其叔王湛比魏舒为强，谢安评价“罗友诘减魏阳元”，阳元正是魏舒之字，被评价三人恰好都为“痴”类人物，倘不识“阳元”为谁，就可能与这一论点失之交臂；论权力意志的异化，由殷仲文叹患“当复出一孙伯符”（伯符正为东吴创业者孙策之字）发掘殷仲文的政治野心，也是同类之例。

著者也喜欢情聚缘生与渗透主观感悟的著述方式。犹忆在台湾佛光大学，师范大学博士范纯武兄尖锐发问：提高到天地生成、男女生成的高度，来理解曹植“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诗句，怕是曹植

本人未必想到,后人未必想到,今人未必想到,应是有刘氏标记的解释。除了悦服承认,追求主观感悟的客观化,也不放弃以感悟激活、深化对事物的理解,当是著者努力的方向。

发掘刘邵对中国古典“英雄”概念的阐释,是著者遭遇千载一晤的特例。在世纪初一个深夜的两点多钟,万籁俱寂,整个世界都在黑暗之中酣睡,著者生命史上一个艰难然而幸福的特定时刻悄然来临。著者深信,今生今世,只有在这一时刻,才有可能真正把握住循名求实、综练名理的名家重镇刘邵。倘昏然睡去,则将永失此千年一会!著者是以灵魂的颤栗与虔诚向一位往古先贤致敬。在经历了这一学术夜晚后,著者对学术与人生的认识,若有所悟。

第四,著者崇仰太史公的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著者的求学经历中,的确也遇到了象杜经国师、高尔泰师这样具有敏锐历史感悟力与穿透力以及学术预见的非凡特点的学者。杜师在20世纪70年代末即已预言苏联的解体,并以非凡胆识主讲实践与真理的关系;高尔泰师则被流放到敦煌莫高窟,在几乎与世隔绝的恶劣环境中,炼就他对中国文化与美学的基本观念,并在复出后显示了超先于学术潮流的哲人风范。他们使著者对中华文化智能持有坚定的信心。故对“英雄”问题在魏晋文化与文学研究中的关键意义的发掘,以及注重学术明流与暗流关系,由阮籍在魏晋易代那样的敏感时候,反而公开评价写《鹤鹤赋》以自“小”的张华为“王佐之才”,考究二人特定深层关系这样一个独特点契入,全面展开阮籍创作时与赋体创作思维的探讨,都是著者见贤思齐的尝试。

第五,也尝试从感悟出发革新传统研究方式。如传统意义上的考据,多是单向度的。著者则抓住阮籍全部6篇赋作的作时与司马氏从窃权到篡权时间一致的高度巧合,考辨阮籍后期“不与时事”、谨慎待时的真象,似乎能够较好解释阮籍后期不少为学界认为矛盾难解的问题。一般认为理论探讨与考证难并行。著者则通过考辨阮籍6赋来揭示阮籍的赋体创作思维。

四

简单说明一下本书的出版缘起。

本书曾以《魏晋文化与文学论考》作书名,于2002年5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但当时时间紧张,书中不少内容需要修订;另一方面,只印了1000册,仅以赠书方式与海内外学界前辈与朋友交流,实际没有进入流通市场。尤为痛心的是,8篇自认为最重要的文章,有数篇甚至是十余年殚精竭虑而成,都收在书中首次发表,因版权问题,也无法以论文形式在更广范围向学界朋友请教。

2002年11月,著者应邀赴台湾佛光大学、中国文化大学进行学术交流,《“英雄”与“英雄”时代的文学》的讲题,受到关心中华文化的台湾同仁的重视。佛光龚鹏程校长、李纪祥教授等并提出编辑两岸文化交流丛书。这一构想得兰州大学出版社领导的高度支持。本书也因此得以作为丛书首辑中的一本出版。有缘携本书为两岸文化交流略尽寸心,深感荣幸。尤其要衷心感谢甘肃人民出版社韩慧言主任、责编连凌云先生、特邀责编范海成先生的宽容、理解与支持,也感佩兰大出版社关心文化事业的热情与魄力。

需要特别感谢的是,本书初版时,著者的导师赵逵夫先生曾于百忙之中赐序,研究生时的导师郑文先生也以93岁高龄赐序,劝勉有加。这次因为丛书体例的缘故,他们的序言没有收入,这是十分遗憾的。赵师严格督导著者下苦功研读文史哲原著、别集,对培养著者养成严谨学风和提高写作能力,付出很多心血;郑师长期关怀、悉心指导,著者将永远铭记师恩,以加倍努力来报答他们的厚望。

龚鹏程校长欣然为本书题签,特致谢忱。

对以各种方式帮助著者完成本书的前辈、老师、同仁、朋友与亲人致以衷心感谢。正是你们的支持与鼓励,使著者在孤寂的学术研究之途充满力量与勇气。

五

最后,向读者朋友三致歉焉。

一是,尽管此次出版,著者在初版基础上作了较大范围的修改,